

中国电视人的冬奥初体验

夏天 魏洁

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是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后首次出席冬季奥运会。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参加的冬季奥运会。为了更好地记录中国冰雪健儿的冬奥之旅，中央电视台派出了4人采访小组。这4位记者，也成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批站在冬奥赛场的中国记者。当时参加报道的记者李凯在《中国体育赛事转播口述史（1958-2020）》项目中，回忆了当年的经历。

影：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中央电视台报道组合影（从左至右）李凯、陈谷华、王兴华、冯一平



初到普莱西德湖

1980年1月28日中午，中央电视台派出的记者团一行四人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出发，乘大轿车仅一个多小时就进入了美国境内。当晚就抵达了普莱西德湖。

“热情”，这是中央电视台记者李凯对普莱西德湖这个小镇的第一印象。这个仅3000人口的小镇，却早在1932年就有过举办奥运会的历史，当地人对自己一生中能为在家乡举行的两届奥运会服务而感到骄傲。李凯回忆说：“我们在街上曾看到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跑向市政厅，那是当地康尼亚克大学的学生，为支持奥运会，自发筹集了资金，正亲自去把支票交给市长。”

不仅年轻人，当地老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迎接冬奥会的到来。2月4日下午，李凯正在大街上采风，迎面遇到一位满头白发、蓄着长白胡子的老人，朝着他笑眯眯地走过来。老人一句话也不说，塞给他一块糖就走。正在疑惑时，发现老人便人便送。走过的汽车见到老人也停下了，老人照例每人送一块糖，李凯的同伴对他道：“上午就见过他，只不过送的东西不同，上午送的礼物是每人一张明信片，背面贴着一颗红心，签着他的名字和题字。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老人。”

由于举办奥运会，普莱西德湖涌进了上万游客。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在出售带有本届奥运会标志的诸如钥匙链、纪念章、玩具、照相机之类的纪念品。还有一种新奇的罐头，里面装的并非水果、肉类，都是普莱西德湖1980年冬季的雪。据李凯观察，销路还不错。

奥运会前夕，这里的旅馆都涨价了，镇上的很多居民也都腾出了自己的住宅供出租，组委会为此成立了一个住房控制公司，掌握了6000间客房，并规定了价格。房租涨价到1978年9月1日房租的135%的基础上再加15美元，围绕普莱西德湖的9个小镇也在这个基础上加收5美元。

组委会正式安排给中国记者的住地是距离新闻中心15英里的阿波达，这个旅馆每年冬季都封闭，只有这一年才遇到赚钱的机会。旅馆的老板豪爽热情，喜欢打猎，因此大厅内全是他的猎物标本，有鹿、野猪、鱼……每只都有猎获地点、时间的记载。整

个旅馆里显得壮观而别致，这是她女儿和女婿专门设计的。

李凯回忆道：“他们全家人都对中国记者们很热情，多次到我们的房间看望，将成把的圆珠笔作为礼物送给我们。冬奥会期间正值我国的农历春节，除夕那天我们准备吃饺子，本想请他帮忙提供一个场地，结果他不仅把自家厨房让出来，还给我们提供菜和面，非常有趣地打听中国节日的民俗。”

“赛事服务”见闻

由于中国是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合法席位后首次出席冬季奥运会，所以李凯和他的同事们都很重视，早早就到了新闻中心。当时新闻中心外挂着万国旗，却唯独不见五星红旗，反而是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李凯一行人马上找到组委会办公室去强烈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拥有合法地位的，为什么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通过沟通才知道其实是他们的工作失误。工作人员得知自己的失误后非常抱歉，连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千万不要声张，现在我们临时更换，因为会引来其他国家的记者造成更大更坏的影响，我们晚上立刻更换。”果然，李凯第二天再去新闻中心，五星红旗就已经飘扬在万国旗中了。

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期间，李凯每天往返于住地、比赛场、新闻中心。“他们的媒体服务做得真不错”，李凯回忆道：“虽然赛场和驻地之间相距很远，交通却很方便，每天都有大轿车不停地运转，从零点开始一小时一班，凌晨5点以后每半个小时就可以等到一次班车，非常准点。另外，为方便记者，还有60辆面包车供随时调遣。”一次雪橇比赛后，李凯和同事们急于从雪橇场返回新闻中心，就打电话给总调度，总调度回答说：“非常感谢你给我打来电话，请你告诉我你们的准确位置，我立刻派车去接。”只几分钟，一辆面包车就开到李凯面前了。

学习赛事转播

在出发去普莱西德湖之前，李凯和同事们确定了报道计划和拍摄内容，还



李凯
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工作证

提前了解了中国运动员的个人信息。本以为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但是到达普莱西德湖发现，那时候中国运动员的水平跟中国电视记者的水平差不多，都是比较落后的，所以需要向国外同仁学习经验。

美国ABC电视台是这届冬奥会的主播电视台，仅冬奥会转播的筹备工作就进行了整整3年。他们投入1300人，在山沟里搭起了2万平方米的技术机房和演播间，架设了4个卫星地面站，铺设了几百公里的电缆。这对于仅带了3台摄像机参与本次报道的中国记者来说，十分新奇。

在媒体中心，李凯还用一片感冒药结识了一位美国电视转播的总监。这位电视总监感冒了，李凯就把从国内带来的药给了他。一来二去，就算认识了。两人经常聊天，聊设备、聊参加人员，还有不同项目，美国的摄像机怎么配置……几乎所有摄像的设置位置李凯全都用笔记本记录下来。李凯感叹道，先进的电视转播方式和理念是此行的最大收获。

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李凯就窝在酒店看美国的体育频道，即使听不懂，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他也能看出ABC对画面的处理非常到位。首先，李凯发现他们的画面非常工整：“每个摄像师尺度把握得非常好。导播要什么景别，摄像师就呈现非常完整的全景，说要到中景就给到中景，说要到人物的近景就给近景，画面表达非常清晰。但是咱们国家

那时候做得还不好，导播要什么画面但是摄影师还没准备好，切到某一机位时还要移动一下。其次，他们不仅画面特别工整，衔接还特别流畅，全景的镜头是不能下一个接全景的，全景要接中景，中景过再近景，近景以后再给我全景……”这是现在电视转播画面最基本的组合。

当时李凯所在的体育部派出的所有设备就仅仅是3台摄影机，每个机位只拍一个角度。李凯向领导建议把其中一个设备改成肩扛的，摄像机就可以在场地里活动，不仅可以拍到运动员的中景近景，还能拍到暂停的时候教练员特写等其他镜头，来丰富画面。但领导并没有采纳李凯的意见，坚持用3个固定机位。

那时的拍摄十分辛苦，4人报道组3台摄影机，每天要在各个赛场往返二三百公里，却只能拍到四五个项目的比赛。严寒的天气，使得靠马达驱动的摄影机不间断“罢工”，为了恢复它的转动，记者们经常要把冰冷的“大铁疙瘩”捂到自己的怀里。机器被捂热了，才能继续工作。

这就是中国电视人第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中国人眼中的冬奥会。用李凯的话说，那时中国电视的水平与冰雪运动水平一样都属于世界末流，但我们现在能够举办冬奥会，中国体育赛事转播水平也早已位居世界前列，40余年弹指一挥间！

（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胡适醉酒闹元宵

沈治鹤

1904年春节刚过几天，13岁的胡适到他大姐家拜年。住到元宵节这天，便和外甥们一同回家看花灯。大姐家的长工挑着新年年糕等礼物，跟随胡适回到安徽绩溪上庄村。走到村口三门亭，见供着几座神像。胡适便指着神像对外甥说：“现在没人，我们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茅厕里去，好吗？”

在那个时代，这无疑是在胡闹。那时，天资聪颖的少年胡适已读了不少古书，对鬼神早已不信。他外甥虽然听他说过无神论的故事，却不敢想象舅舅真会付诸行动，更不曾想到会邀他一起把这路亭里的神像捣毁。长工听了吓得连忙劝阻：“舅舅，菩萨是不得得罪的。”一听这话，胡适心里更不服气，弯腰拾起石头，用力向神像砸去。这时正好听到有人路过，长工拉起胡适就走。

晚上吃饭时，胡适空腹喝了一两杯烧酒。饭后走出大门，冷风一吹，他便飘飘然了，对着天空大喊：“月

亮，月亮，下来看灯！”身边的小孩也跟着起哄：“月亮，月亮，下来看灯！”喊声惊动了屋里人，母亲冯顺弟叫人唤他回去。怕母亲责备，胡适撒腿就跑。有人说，可能是烧酒喝多了，怕是醉了。他母亲担心，跟着追了出来。被冷风一吹的胡适，酒劲一上来，不顾一切地想摆脱拽着他的人。冯顺弟乘机抱着他，胡适嘴里仍喊着要月亮下来看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胡适嘴里仍胡乱喊。好不容易把他拖进屋里，左邻右舍一群人也就跟着进来看热闹。

这时，长工走进他母亲低声说道：“舅舅今晚怕不是吃醉了酒吧？今天我们从屯中出来，路过三门亭，舅舅用石头砸了几个菩萨。他今夜胡言乱语，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罪下来了。”

母亲立即叫人抱胡适，独自去洗手焚香，双手合十，求神道宽宏大量。不久，闹腾够了的胡适疲倦不堪，不知不觉睡着了。

元宵借酒闹胡闹的少年胡适，就这样蒙混过关了。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汪曾祺正月十五看“围屏”

姚秦川

汪曾祺的家乡虽然地处温润的南方，不过，他们那里并不像别的鱼米水乡那样，每到元宵节便到处张灯结彩，耍狮舞龙。相反，他们那里在过元宵节时，“不但没有龙灯、高跷，也没有花担子、茶担子，甚至连最普通的跑旱船都没有，安静得很”。

虽然元宵节当天少了那种热火朝天的喧闹，但当地还有另一种别样的“游戏”：送麒麟。元宵节一大早，会从附近的村子走来三个年轻的汉子，其中个子最高的那个左手举着用纸糊的麒麟，右手举着一张长板凳，走在三人的最前面，紧随其后的一个敲小锣，一个打鼓，咚咚当当地一路敲来，嘴里同时唱着一些吉利的歌谣。每到一家门前，那三人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歌声似乎比刚才又响亮了一些”。此时，主人也图个吉利，送给他们一些糖果点心之类的食品。一群半大的孩子跟在那三个人的

屁股后面，嘻嘻哈哈地闹着笑着，甚是快活。

除了送麒麟外，元宵节那天，当地还有另外一种有趣的活动：看围屏，这个活动在别的地方很鲜见。围屏由硬木长方框做成，约三尺高，尺半宽，镶绢，上面贴着一些演义小说中人物的故事。一堂围屏约30幅图画，屏后点上蜡烛，这实际上就是照得透亮的连环画。

当时，汪曾祺最喜欢做的事便是看围屏。看围屏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炼阳观的偏殿，一处是城隍庙里的火神庙。炼阳观画的是《封神榜》，火神庙画的则是《三国》。当时，看围屏让年幼的汪曾祺增长了知识，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时间。

虽然围屏看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汪曾祺说自己“从不厌烦，总会年年去看”。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写道，“不看围屏，好像就不算过节似的”。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吴作人重绘《漠上图》

崔鹤同

1963年初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探望了因冠心病在家休养的吴作人，并说以后常来看他，不预先告知，希望“不拘形迹”。吴作人很感动，便将自己最新创作的水墨画《漠上图》相赠。《漠上图》画的是西北塞外茫茫大漠，众多骆驼正在跋涉、奔跑，驻足凝视或仰天长啸，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苍凉、辽阔而又雄劲、峻峭。邓拓回家后，将画裱成长卷，并题了长跋，珍爱至极。

1964年2月，吴作人受邀参加了由邓拓组织的报告会。会开到一半，吴作人因身体不适中途退场。过了两天，邓拓到吴作人家中探病。

1957年，吴作人险些被打成右派，1958年他虽然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但是并不能真正意义上主持工作，此外还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认为他推行“资产阶级的艺术观”。因此，吴作人仍心有余悸。过了几天，邓拓特地到吴作人家中，送来手书“放心”二字，希望吴作人能

够放下心中的包袱，养好身体。吴作人接到这张长幅，心中感到非常温暖，身体也有了逐渐好转的趋势。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5月，邓拓被诬陷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首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为了不牵连到别人，邓拓很早便开始处理友人相赠的物品。可惜，邓拓的努力并没有让吴作人逃过劫难，很快他就因“三家村事件”饱受批斗之辱。

一天，吴作人忽然被院革委会叫到办公室，革委会主任要求吴作人重画他之前曾经送给邓拓的手卷《漠上图》。《漠上图》原作已被邓拓焚毁以免牵连吴作人。但是已有造反派举报此画作为吴作人所绘，所以革委会要求吴作人照原样再画一幅，以作为他反党的罪证。

那时吴作人已被勒令停止作画，有此机会，他极为珍惜，也全然不怕留下“反党”的罪证，授人以柄，自绝后路，竭尽心力重新绘制了《漠上图》，这也是他与邓拓肝胆相照、莫逆之交的最好见证。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钱伟长为新生讲话

周二中

笔者在民进江苏常州市委会机关工作，一次，单位上几个人在一起吃饭，话题不知怎么就聊到了科学家钱伟长。单位办公室主任钱开宁说，他在上海大学读书时，钱伟长是他的校长，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

2002年9月份，上海大学在宝山校区举行秋季开学典礼，当时有几千名新生都参加了开学典礼。钱伟长校长还特意来为新生讲话。当时，钱校长已经90高龄了。

钱开宁回忆说，当时学校考虑到钱校长毕竟年纪大了，不能让他多劳神，只是想请他出面为新生提几点简单的要求。校方原准备让钱校长讲几分钟，不料讲着讲着，钱校长非常投入，早已超过了原定的时间。

钱开宁说，钱伟长有一句名言：“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那天，钱伟长为了解激发学生从进校门第一天起就树立起为国而学的雄心，他讲到了自己当年求学之路。当年，钱伟长的文科非常好，而物理却不理想。当时

他被清华大学文科录取，然而入校的第二天天，正是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对此，钱伟长义愤填膺，他说，如果我们中国有更多的飞机大炮，日本就不敢这样欺负我们。而造飞机大炮，必须靠物理，靠实业。为此，他找校领导，坚决要求换专业……

钱伟长还说到自己留学以及后来艰难归国的往事，说着说着，他突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钱开宁说，多少年过去了，他依然没有忘记这个场面：老校长那满头的白发，那轻轻的啜泣，以及那虽不洪亮却坚定无比的叮嘱声……老一辈科学家一心报国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钱开宁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好的一堂思政课。

钱开宁到现在还记得钱老校长的一番话：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爱国精神，在实现个人价值之上的，应该是对国家、社会、民族的责任感。

钱开宁回忆说，那一次可能是钱老校长最后一次在学校开学典礼为新生讲话了。

夏明翰遗属的故事

刘凯

夏明翰是中国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革命活动家。1928年初，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的夏明翰由于叛徒出卖，在武汉被捕。3月20日，夏明翰在汉口刑场牺牲，年仅28岁。夏明翰牺牲后，其妻郑家钧带着女儿夏芸过起了逃亡生活。为了养活女儿，郑家钧给人绣过织品，糊过盒子，通过打零工来赚钱维持生计。47年中，她拒绝了组织上的特殊照顾，自力更生，含辛茹苦地养大女儿，彰显了一位烈士遗孀的伟大胸襟和革命精神。

郑家钧与夏明翰相识时，是长沙一家绣场的绣工，出身贫苦人家，没有读过书，但是在思想进步的表哥影响下，她成了一个爱国爱党、支持革命的人。她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绣工，但也经常参加工人的罢工游行。

在一次工人罢工游行时，郑家钧为掩护一位年轻人而受伤。她掩护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夏明翰。夏明翰很感激郑家钧救了自己，同时也心疼郑家钧为自己受了伤，于是两个年轻人便因此相识了。后来经过毛泽东做媒，夏明翰和郑家钧在1926年结婚，当时来贺喜的人中有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他们还专门送了一幅“世同惟有家均好，天下谁比明翰强”的对联。郑家钧很崇拜夏明翰的才学，在夏明翰面前她感到很自卑。但夏明翰没有嫌弃她，经常教她读书识字。1927年阴历九月二十六日，郑家钧生下女儿，夏明翰非常高兴，替女儿取名赤云（后改名夏芸）。

1928年夏明翰牺牲后，郑家钧悲痛万分，但她很快从悲痛中走出来，因为她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把她和夏明翰的唯一女儿养大成人，为国家出

力！这期间，有人劝她再嫁，这样母女日子会好过些。但是郑家钧拒绝了，她带着女儿去了上海，过起了逃亡生活。当时，国民党特务到处追杀郑家钧母女，她只好骑着三轮车驮着女儿流离颠沛。为了供女儿上学，郑家钧每天拼命干活，除了睡觉基本上无时无刻不在做工挣钱。上海沦陷后，母女俩的日子更苦了，郑家钧只好带着女儿继续逃亡，几经辗转回到了长沙。

回到长沙后，地方党组织很快就派人找到了郑家钧母女俩，并想为母女俩提供特殊的照顾。但是，刚强的郑家钧拒绝了组织上的好意，她不愿意给组织上添麻烦，她上报党组织：我还有一双手，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女儿和自己，请组织上把钱和物送给其他需要照顾的烈士遗孀和遗孤。在那炮火连天的战争时代，一个瘦弱的女子独自将女